

# 最近大陸情況分析

蔡維屏

本文係本中心主任蔡維屏博士應邀在今夏國家建設會所提出之報告，  
特予刊載，以饗讀者——編者。

最近兩年來，中華民國和中國大陸最鮮明的對照是：中華民國是在安定中求進步，中國大陸則要從突變中找出路。中共政權統治大陸卅年，毛澤東用權謀，用暴力來排除異己，整肅同僚，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中全面的向幹部發動鬭爭，始終未能獲致內部團結和政治的安定。

中共政權組織人民公社，用嚴密組織和監察制度來榨壓人民、增加生產，可是卅年來，迄未能解決糧食的匱乏，據李先念說，今日農民所分配到的食糧，甚至比廿年前還少，並且在農村還有一億幾千萬人，得不到足夠的食糧。

中共政權大力提倡以自力更生方式促進工業，從土法煉鋼到學大慶運動，經過卅年，工業不但未能趕上已開發國家，甚至比許多開發中國家還要落後。

中共政權不斷表示要培植青年，毛澤東倡議「老」「中」「青」三結合，是要由「老」「中」來帶頭，訓練青年，庶使成爲中共的接棒人。可是每年七八百萬中學畢業生，除了升學大專院校的三十萬人外，大多數被下放農村，不但未能有計劃的培育青年，反而大規模的浪費人才，形成今日無法解決的嚴重問題。

毛澤東一向宣揚軍事革命化，以爲打游擊戰是革命部隊的特長，人海戰術是可以破帝國主義國家的堅甲利器的。彭德懷在韓戰以後主張軍事現代化，毛恨之入骨，後來整肅彭德懷時，毛便以此指控彭有親俄企圖。其後羅瑞卿也有與彭相同的主張，也遭被整肅的下場，以後便沒有人再提軍事現代化了。

直到美國前國防部長史勒辛格一行訪問中國大陸以後，才被發現它是一支裝配至爲落後的軍隊，不堪用以牽制蘇俄。在鄧小平發動「懲罰」越南戰爭期中，共軍集結了大量飛機在中越邊境，但是因爲顧忌越共性能較高的戰鬪機，不敢參加作戰，以致造成地面部隊慘重的傷亡。

中共一直想建立領導中心，使全國九億人民，無條件的爲黨，爲「國家」，爲「領袖」奉獻一切。多少年來，從幼稚園起，各級小學生，都要唱不愛爸媽，祇愛「毛主席」，也曾教導全國軍民，熟讀毛語錄，把毛語錄奉爲神明，但是今天一般人民對中共已失去信心，對上級指示，陽奉陰違，農工大衆怠工，知識分子掀起民權運動。

這一切一切，都是中共領導階層早已知道，現在且公開承認的。所以毛死亡和四人幫被捕後，新的當權派充分瞭解：如果再循毛的政策路線，毛的做法，便是走進了死胡同，情形會更壞更糟，以致於不可收拾。所以他們要變，尤其是鄧小平一派，對毛的翻雲覆雨作法，憤恨無已，且本身便曾是在毛的刀俎之下的犧牲者，更希望快速的變，大幅度的變，來找生路。

## 壹 領導階層的內部鬭爭

一九三五年毛澤東在貴州遵義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中，獲得中共中央軍委會主席職位，自那時起，他掌握中共軍權達四十二年之久。後來，他以軍權爲基礎，在延安發動「整風」運動，整肅國際派，而於一九四五年出任黨主席，先後有卅二年之久。在「三面紅旗」失敗之前，毛已任國家主席十年，一九五九年讓位於劉少奇。到一九六六年，發動文革排除劉少奇。這以後中共便不設國家主席，而由毛實際控制政府，總計前後達廿一年。誠然，在任何極權政體之下，獨裁者身亡後，總會由繼承問題而引起政治上紛爭；但是在中國大陸，由於毛獨攬黨政軍大權三四十年，而對身後的繼承問題也沒有妥當的安排，必然的會發生嚴重的鬭爭，且使政局長期的不能安定。所以在毛死後，便發生「四人幫」被整肅和華鄧的對立。後來經由元老派居間制衡，暫時撐持着三頭馬車（華、葉、鄧）的權力結構。鄧小平要想變，在思想路線和政策方針上都要變，但是華鄧之間仍有重大分歧，間歇性的明爭暗鬭迄未終止，以致於鄧小平等要想大幅度的變，却無法辦到，要想以「變」來達成領導階層走向安定團結的目的，更是不可能。

譬如說，對待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問題，鄧派就主張對毛所犯錯誤作深入檢討，否則，錯誤便無法改正，政策路線就難以轉變，他們提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不論是馬克思主義，或是毛澤東思想，都要經過實踐的檢驗才能證明其是否正確。但是，在中共中央的會議裏，老幹部們雖然對「實踐與檢驗」這一套，加以讚許，但却對毛的錯誤所在，不作斷語。這是因爲一方面文革餘黨大力阻止匪黨內外的反毛活動，一方面元老派認爲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毛思想，無異否定了中共二三十年的成就，使中共在思想上變成真空，同時如此做法必定掀起黨內極大風暴，不但不能促進團結，還要使黨內的權力鬭爭趨於白熱化。據悉以陳雲、彭真、陸定一爲首的一批「反毛派」，已發展成爲黨內第三勢力，他們的言行也往往與鄧小平對立。

鄧派在各方壓力之下，不得不尋求妥協，提出四個「堅持」：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從這「堅持毛澤東思想」來看，鄧原想要以「實踐」來檢討毛思想，而在政策路線上作大幅度轉變，至少在目前是無法辦到。

又譬如說，清除四人幫餘黨問題，鄧派也是力主除惡務盡，以絕後患的。華派與四人幫關係很深，主張擴大教育面，縮小打擊面。在這一方面，鄧派運用其掌握的傳播工具，包括一部分大字報，對四人幫餘黨中的省級領導幹部展開攻擊，結果有天津解學恭、遼寧曾紹山，內蒙尤太忠，北平吳德，河南劉建勛，陝西李瑞山等六個第一書記及革委會主任被革職，由鄧派老幹部接替，但是中共中央却沒有把這些和四人幫有很深關係的汪東興、吳德、紀登奎等排出中央政治局。

事實上，四人幫雖被打倒，四人幫餘黨的勢力仍然是相當的大，尤其是在省級以下幹部和共軍團級以下軍官裏。在鄧派開始鎮壓各地民權運動時，四人幫餘黨，便在上海等地向鄧小平作有力的攻擊。現在汪東興等人仍在政治局內，鄧小平要想把這個派系勢力清除，在領導階層中建立他的優越地位，產生一個由鄧派所可支配的團結安定的局面，除非再經過一場鬪爭之外，是不可能的。

再譬如平反問題，文化大革命期間，發生的所謂「冤案」，「假案」，「錯案」極多，牽涉也廣，因為在那個史無前例的大動亂中，毛澤東和四人幫要整肅中共幹部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在這一方面，華鄧之間，也有衝突，鄧要徹底平反，華主張有限度的做，因為有些案件，牽涉到華本人和吳德等人。在這個問題上，鄧算是有限度的勝利了，中共中央為與鄧小平直接有關的天安門事件和「反擊右傾翻案風」案，徹底平反。同時，還為彭德懷、陶鑄、薄一波、楊尚昆平反。隨後又平反了大量案件，包括引發文化大革命吳晗的「海瑞罷官」歷史劇，也包括彭真、陸定一等人。但是對於劉少奇，和文化大革命本身，始終是保留，因為這兩個問題，直接牽涉到毛澤東的錯誤的認定。

另一項由平反而帶來的問題，是從監獄裏釋放出來的解放幹部，據說一共有八百萬人之多，他們無工作，無家可歸，口口聲聲要「回朝當政」，在各大都市滋擾，有時加入民權運動行列，攻擊當權派，中共領導階層也為此而相互攻擊，明爭暗鬪。

從以上可以看出，鄧小平回朝當政之後，眼見全國上下對於四人幫的痛恨，對於毛澤東禍國殃民的作法的不滿，他以為這是他剷除異己、改變黨的政策路線、攫取領導權團結內部的最好機會；可是，中共內部分歧，由來已久，中共政權面臨許多問題，困難重重，也不是「約法三章」式的辦法可以解決。因此，鄧小平派勢力雖佔上風，但是要想為所欲為，便遭遇堅強抵制，甚至可能引發另一回合的權力鬪爭。

## 貳 「現代化」必然遭遇的困難

誠然，中共要推行「四個現代化」並非自鄧小平開始。在五十年代，周恩來便曾提出過農業工業國防和科技現代化的口號。不過在四人幫被打倒以後，華鄧所標榜的四個現代化，所提出的十年經濟規劃，都很明顯的放棄了毛的自力更生的觀念。他們要大量的從資本主義國家引進資本和技術，這不能不說是在作大幅度的改變，希望從「變」中找出路。當中共把這「四個現代化」的招牌打出來的時候，西方國家中很多人看到計劃中所訂的誇大的生產目標，對於鄧小平的作風，不無稱道，對中國大陸未來的市場，不勝嚮往。

但研究中國大陸問題的專家們的看法，截然不同。出席中、美「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的專家們認為：卅年來，大陸農工業成長緩慢。遇到天災和人為風暴，便呈停滯甚至倒退，而人禍為害之大，尤甚於天災。中共推行人民公社和大躍進，便曾導致生產萎縮，全國饑荒。文化大革命期間，攻擊劉少奇的「獎金」和「自留地」制度，也使生產倒退好幾年。專家們也認為，一個國家經濟的發展，除了需要安定的政治環境以外，還需要一個持續的經濟成長為基礎，更需要農工大眾積極工作的情緒。

從中共卅年來經濟成長情況來看，鄧小平所設計的目標，高不可攀，是不可能達成的。華國鋒曾說抓綱治國和建設的實績要一年初見成效，三年大見成效，完全是政治的宣傳，現在已距三年之期不遠，事實證明當初所宣佈的計劃，處處誇大，完全沒有細密籌劃，連作業藍圖也付之闕如。

在今年前半年中的一連串中共中央的會議，政治局會議和五屆二次的人代會裏，華國鋒、李先念、陳雲等人都先後承認一九七八年的計劃過於龐大，事實上行不通。陳雲說：『今年經濟情況甚差，財政有大赤字，外匯短缺，預算必須削減，若干部的預算要削減三分之一』。李先念說一九七八年的工業投資嚴重失調：『上海寶山鋼鐵廠的投資可以建造五百個輕工業工廠；向澳洲買鐵砂，運費巨大，原料也無切實保障……現在基地工程業已進行，暫時必須擱置下來』。因此，在本年四月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裏決定以一九七九和一九八〇為調整時期，來對上述工業失調的情形加以整頓、改良。然後實施自一九八一至一九八五的五年計劃。現在中共又把調整時期由兩年延長為三年。如此看來，華鄧匆匆提出的十年經建計劃，已被擱置。據加拿大多倫多環球報報導一則北平的消息說，在這整頓的過程中，將有成千上萬無利可圖的工廠會遭關閉。

中共在最近期間，曾不斷強調農業問題，認為「抓好農業，就抓住了加速四個現代化的根本」。原因是農業生產和糧食生產增加率太低，造成了嚴重問題。李先念在這次人代會的籌備會議中透露，在大陸上九億五千萬人口中，百分之十的人吃不飽。而

在中共中央「四號文件」——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中指出：「還有一億幾千萬人口糧不足」。回顧自中共政權成立以來，農業生產的增加，被人口的增加抵銷了，所以卅年以來，人民所得食糧並不比以前多，人民的生活水準也沒有提高。事實上，外籍記者們所看到的，也證實李先念的報告：中國大陸現在有高度的失業和普遍的饑荒。

造成這種情況的因素很多，但是我們同意中國問題專家的看法，那便是：中國大陸的農工大衆缺乏工作情緒，是農工業生產不能大量增加的最主要原因，加州大學史卡拉賓諾教授一九七八年暑訪問大陸歸來以後說，他在這次訪問中印象最深刻的是：「中國人最優良的傳統——勤勞——在大陸上已完全消失了」。倫敦康特大學鄧肯生教授在今年初訪問大陸後說，在北平和上海看到成千上萬的人遊蕩街頭；工廠裏也好，政府機關也好，大都是無精打彩，甚至簽了到便到街上遊手好閒。美國專欄作家羅勃·諾威克今春在大陸訪問獲准前往哈爾濱參觀的一家規模很大的工廠，百分之七十關閉，祇有百分之三十開工，他不經心的誇獎了在廠的工人，說他們的勤於工作，支撐了這百分之三十照常開工，工人們立即駁回：「誰告訴我們樂於在此工作？我們希望這百分之三十也一齊歇業。」

農民工作情緒低落比工人尤甚，因為農民工作地點分散，監督不易。這原本在所有共產國家都是如此，但是在技術愈落後的農田上，管理監督愈困難，故今日中國大陸農村裏的「亂、散、低」，比蘇俄和東歐共產國家尤甚。

這一類的報導最近愈來愈多。大陸上的農工大衆完全沒有工作情緒已是不爭的說法。

這其中部分的原因是工資過低，長期未作調整，兩年前，中共中央曾經作過小幅度的調整——限於最低三級工資的工人們，各增百分之十五，所增幅度雖小，但人數甚多，如此小數額工資的增加，已造成全國性的通貨膨脹，於是中共中央又限令將增加部分一律扣存在工人的帳戶內，不得提用。

另一個主要原因是：農工大衆對中共政權喪失信任。當華鄧宣傳四個現代化及「三年大見成效」的時候，逃港難民人數突增，他們到了香港以後答覆記者說：他們不信三年後生活能够改善，相反的他們深信，這是一種預告：三年內生活將愈見貧困。

在農工大衆工作情緒低落情況下，生產難有增加，而生產不能增加時，中共政權自無法提高農工大衆日用必需品的供應量；這便形成一種惡性循環，是任何計劃，任何劇變，也解決不了的難題。

中國大陸的貧窮是人所共知的，經過中共公社制度的長期剝削，經過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的大規模破壞以後，要大量增加生產，庶可有餘額出口，換取外匯，以應建設所需，自屬難上加難。如今中共出口大宗中的（一）農產品（二）綿紡品（三）石油，都是供應國內所需尚嫌不足，又怎能恃以擴大外銷數量以賺取外匯？故中共「現代化」的推行遭遇困難，固然是原訂計劃漫無標準，野心過大，即令當前的「調整」「縮小範圍」，以後的發展計劃，也同樣會因外匯短缺，償還能力過低而遭觸礁。

最後，中共推行現代化吸收外資和技術也因人才缺乏，對國際市場的無知，造成許多錯誤和失敗。即令比較單純的觀光旅社

，出口加工區的籌建，也因為產權問題，和當地工人管理權，工資發放等問題而一一擱淺。基於以上，有人以為五屆人大製訂了「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便可解決許多問題，那未免太天真了。

### 叁 青年下放問題的嚴重性

最近中共中央透露：大陸每年中等學校畢業生七百餘萬人，但大專院校所能容納的不到三十萬人。過去這許多不能進入大專院校的青年，絕大多數是被下放到農村，卅年來累積至數千萬人之多。他們在鄉村裏的失望和憤懣，是不言而喻的。真正的問題是到了農村以後，沒有書刊可以閱讀，無法自修，所學日見荒廢，同時，他們也沒有機會學習工藝，到頭來這幾千萬青年男女變成爲完全無用之才。這是何等駭人聽聞的人力浪費。

目前的情況是：有些頹廢的，等待「泥土埋葬青春」，有些逃回城市，受治安人員的追捕，也有些受不了這種控制和迫害，起而反抗，在各大城市出版刊物，爭取自由、民主和法治。可見大陸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的後果之一是：增添了數千萬仇恨中共政權並對中共政權失去信心的人，助長了社會的動亂。

實際上大陸各地中學生，到了畢業前一年便惶惶終日。

鄧小平復出後，也曾考慮過改善下放政策，但是他無法使每年七百萬青年獲得工作，更不能讓他們留在都市裏作亂。看情形還是要繼續執行這一個世所罕見的處置青年的對策。據說，在鄧小平就這個問題研議的時候，已被下放的青年，四面八方提出要求，要求中共不要停止「下放」應屆中學畢業生，而呼籲他早日將已下放多年的青年從鄉村裏分批「解放」回到都市來。這是另一項一時無法解決的難題，也是一個嚴重的問題，那些日夜思變的鄧幫人物，也無法因應。

去年十二月，下放雲南的知識青年五萬多人舉行集體罷工，反對永遠被下放在農村，過着失望絕望的生活。本年以來，從鄉村流回上海的下放青年，集體遊行請願，三月五日的暴動事件，是規模最大的一次，臥軌攔車，要求准許留在市區。此外在四川、貴州、湖南、湖北、廣東等省，也有下放青年圍毆共幹和衝擊鐵路局及列車等情事發生。

### 肆 民主假象導發了人權運動

從去年十一月中旬到今年四月初，中國大陸各大城市的民主運動，風起雲湧，迫使中共不得不在本年三月停止民主的假象措施，發出鎮壓人權活動的通告。儘管當權派不承認，在大陸人民心目中，這完全是一九五七年「鳴放」的重演。

中共統治大陸卅年，本質上是以「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等理論為依據的獨裁政治，談不上「民主」「人權」，可是在它「土改」、「鎮反」、「抗美援朝」、「三反五反」、「三面紅旗」一連串的暴政和以後的文化大革命中，人民所遭受的迫害日益加深，依中共當局最近表示四人幫被整肅後，自監獄中釋放出來的共幹已有八百萬人。由此可見，這卅年來，全部被殺害被囚禁的何止幾千萬人。加之近年農工大衆，收入低微，雖辛勞終日，不獲溫飽；下放青年數千萬人，散佈農村，憤恨終身，這情況與「鳴放」時期有顯著不同，「鳴放」期間積極爭取民主自由的大體上限於知識分子，而這一次普及各地的人權運動，則為青年們爭自由爭民主爭法治的強烈要求和農工大衆「反饑餓」「反暴政」運動的合流。這些可以說是大陸人民人權運動的基本原因。

近因方面，是鄧小平領導的「實踐派」要「變」和在「變」的當中打擊文革派的各種陰謀措施所產生的影響。一九七八年十一月的第二次天安門羣衆活動，便是鄧派爲了平反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罷黜鄧小平決議，而利用羣衆來威脅文革派的。北平民主牆和大字報，起初也是「實踐派」所指使的，所以鄧小平一再表示這種行動是中共憲法所許可的，不應加以制止。

鄧小平同時也鑒於在毛澤東獨裁下嚴格控制人民言論和行動的一些極不合理措施，是早已爲人民最痛恨的，所以四人幫的被整肅曾經大快人心。鄧小平等有鑒於此，認爲酌量放鬆管制，可以得民心，可以使民衆獲得若干滿足而提高他們的工作情緒，同時鄧在爭取美國好感和引進西方技術的時候，放鬆一些管制，可以造成一種「民主」的假象，也有必要。可是沒有想到，遭受迫害的大陸人民，特別是青年、知識份子、貧苦不堪的農民，和那些甫出監獄一無所有的解放幹部，乘機展開了一場有聲有色的人權運動。

在短短三個月裏，大陸上出現的人權運動組織，如雨後春筍，發行的刊物包括「四五論壇」、「探索」、「羣衆參考消息」、「中國人權」、「解凍」、「人民論壇」、「今天」、「沃土」、「北京之春」、「民主與時代」、「求是報」等十餘種。這些刊物和在北平上海等各大城市的大字報雖然形式不一，發行的團體也不同，但顯示的目標完全相同，那就是「一方面揭露中共迫害人權的真相，另一方面，掀起一個爭取民主自由平等人權的羣衆運動。」

譬如在「探索」上所刊載的「二十世紀的巴士底獄——秦城一號監獄」，「功德林的『功德』」，「傅月華事件調查紀錄」等，和在「中國人權」中所載「就傅月華事件給公安、檢查、司法等有關部門的一封信」等文，揭露中共迫害人權，無法無天；監獄黑暗，殘酷透頂，比國際赦免組織的報告，更生動，更詳細，更具真實感。

又譬如在「北京之春」第二期中「民主牆讚」一文指出，民主牆是「壓在人民胸中已久的呼聲，埋在人心裏多年的願望」，

在這裏「才能呼吸到自由的空氣，感到民衆的力量」。又如「中國人權」第二期封面所寫的：「爲自由民主，平等人權，爲中華民族的進步繁榮，公民們，團結起來奮鬥前進！」

此外，這些刊物都是公開發售的，有編輯人的真姓名，出刊的地址，並且向中共當局申請註冊的，它們是堂堂正正爭自由的刊物，編輯人也都是負責任的自由鬪士。可是，在三月間，鄧小平受不了各方的指責，也恐懼這人權運動發展到無法控制的地步，於是這些刊物被禁止，傅月華、魏京生等人被捕了。正如中美專家們的判斷，這種具有歷史背景和羣衆支持的民主運動是不可能被長期壓制下去的。

中共在五屆二次人大會議中，渲染他們在制訂刑法、刑事訴訟法等，表示要建立起一個法治的社會，可是中共憲法中規定：中共統治下的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馬列主義和毛思想是國家的指導思想，全國人民必須擁護中共的領導。有了這許多規定，所有法律祇有在不牴觸中共當權派的意旨和利益時才能發揮功效，否則，就毫無效用可言。

在這次人大會中，廢除了各地革命委員會組織，而恢復「文革」以前的地方「人民政府」地位。這並沒有什麼稀奇。中共憲法，過去是三年一大改，兩年一小改。這個革命委員會的稱謂，就是在一九七五年四屆人大把憲法中的「人民委員會」改稱爲「革命委員會」的，說不定下屆人大又加以改變。唯一可以注意之處，便是這次的改變暗示一種貶毛的意思，因爲「革委會」是毛派的一種象徵。

中共的選舉與自由地區的選舉是迥然不同的。所謂「人民代表」的選舉是在中共黨的組織控制之下舉行。譬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便是由中共中央圈定，由政治局審定的。這次人大會把縣一級人民代表改爲直接選舉，以示加強民主。但是中共「黨組織」一向在選舉之前提出候選人名單，所以直接選舉與間接選舉在本質上並無不同。如果有人以爲中共此舉是向民主邁進了一步，那便是太天真了。

## 伍 改變對外政策後所面臨的窘境

中共的對外政策，向以毛澤東三個世界劃分理論爲依據：團結第三世界，拉攏第二世界，反對第一世界亦即美蘇兩超級大國。但在去年一年中，中共當權派作了顯著的改變：第一，將反對兩個霸權國家改爲優先反對蘇俄，倡議聯絡美國建立反蘇的國際統一戰線；第二，以前中共所倡議的反霸統一戰線，是以第三世界國家爲主體，現在的反蘇統一戰線，却以爭取美國、日本和西歐國家爲首要。當中共在積極爭取拉攏這許多國家的同時，它和蘇俄的關係日愈惡化。



去年，中共和日本簽訂了久懸未決的和平友好條約，包含了反霸條款。稍後又與美國建交，在建交聲明中也包括有反霸條款。同時，中共高懸四個現代化招牌，一時使美、日、西歐各國朝野對中國大陸投資貿易之興趣大增，也使中共對吸引外資和技術的希望升高，這正是鄧派人物志得意滿的地方。

不過，在外交政策的大轉變中，中共冀圖能使美蘇間矛盾持續和擴大，以逐漸實現其國際反蘇的統一戰線。中共也寄望引進西方國家和日本的資金和技術，以改善其經濟頹勢和國防落後情況來提高其國際地位和和在國際間討價還價的力量。可是這一年多來，由於國內外現實環境所限，事實證明它要達成這許多願望，還是十分渺茫。

美國與中共建交的同時，積極進行與蘇俄商談第二回合的限武協定，終於達成協議。在中共進軍越南時，日本未予聲援，且相指責；美國則深恐戰爭擴大導致蘇俄的捲入，而公開要求早日停火。這些，都使中共陷入窘境。

在中共與日本訂約之餘，蘇俄便與越南共黨政權訂立協防條約，形成對中共南北夾擊的形勢，中共為突破此項包圍，出兵越南，聲稱懲罰，但結果遭受了出乎意外的嚴重損失，也未達成懲罰的目的。越南不但沒有自高棉撤軍，反而與寮共和高棉新政權結成反中共聯盟，向蘇俄一面倒。同時蘇俄海軍力量，進入了南中國海，形成對中共更堅強的包圍，更大的威脅。

至於吸收西方國家的資金和技術，由於本身條件不足，也由於美國和西歐國家顧及蘇俄的報復，所獲極為有限，且經西方國家企業人士公開表示的冷淡反應，尤使中共難堪。

繼進軍越南之後，中共宣佈終止它在一九五〇年與蘇俄簽訂的友好互助同盟條約，使它與蘇俄的關係達到最低潮。在同時，中共建議與蘇俄談判，以改善雙方關係。談判已在進行，但是和解還是遙不可期。恢復兩方以往的友好關係自不可能，即使想蘇俄撤除在中蘇邊界的大軍都是不容易辦到的。

基於以上的情形，中共頭目們應該了解，要想玩「美國牌」，「蘇俄牌」是要本身具備相當條件的，以今日中共內在困難和危機，在經濟上國防上如此落後，要想在國際間縱橫捭闔，祇有加速走向窮途末路。

## 陸 和談陰謀

如果有人問，為什麼我們不可以和中共談？我就要反問：為什麼要和中共談？

如果有人說，中共要和我們和談而我們拒絕，似乎我們是居於被動。試問：如果中共要談，我們就和他談，就算居於主動麼？

如果有人認為我們這種拒絕和談的作法，可能給人一種印象：中華民國在這一輪統戰中是失敗了。我的答覆是，卅年來我們天天在和中共進行實地的抗爭，我們在每一輪的抗爭中都勝過了中共，諸如土地改革，工業現代化，奠定憲政基礎，實施民主政治，保障人權，充裕民生等，在任一方面，我們都早已打敗了中共。

如果中共頭頭們的頭腦稍為清醒一點，能為億萬同胞幸福着想，便應該及早使中國大陸「臺灣化」，向三民主義歸隊。唯有如此，才能把今天大陸上互相監視的牢籠，變成自由開放的天地，把落後的赤貧公社，改建為現代的均富社會。

國家的統一，是任何中國人的共同願望，但是人所共知，今天中華民國和大陸上的政治、經濟、社會制度和人民生活樣樣都是截然不同的。要統一的話，不是我們接受共產暴政，便是要中共排除馬列主義，廢棄共產獨裁。中共頭頭們當然知道這些都沒有可能。那麼，他們高唱統一，當然是一種統戰伎倆，想以此動搖我民心士氣，來達成他們無法以武力完成的奪取臺澎金馬的目的。

中共要和我們通商通航，但是大陸人民吃飯要糧票，出外要路條，他們沒有行動的自由，沒有買賣的自由，我們能够真正和大陸人民交易和往來麼？

說到通郵，大陸人民對國外寫信是要接受指導的，如果我們同意和大陸通郵，便等於提供中共政權許多它們難以尋找的資料——中國大陸上有那一些人還是臺澎金馬地區人民的情感包袱，那麼，中共便可以無盡止的加以利用。

在今後的歲月中，我們仍然在安定中求進步，中國大陸將仍然在動亂中找出路，這種對照必然繼續下去，而兩方面的建設成就人民生活指標，便越來越懸殊了。所以，對付下一輪中共的和平統戰，我們祇需要提出我們的生活指數和寫實照片，它們便無法招架了。